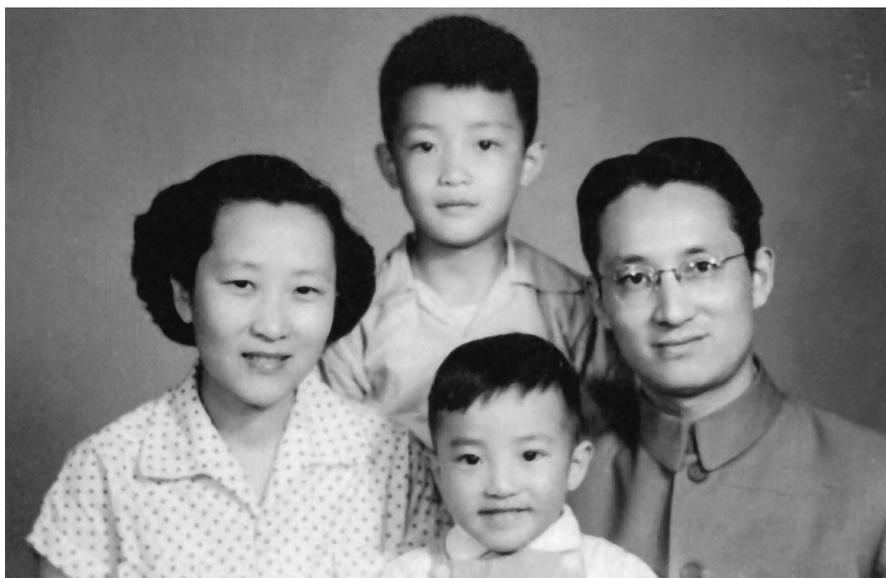


是他坚持扎根人民：“通过艰苦的斗争，搞好一个事业，对人民有所贡献，在群众中生根，这是最大的愉快。”三是人民在他心中分量最重：“工作重要不重要，领导重视不重视，关键在于人民需要不需要。”“生在这伟大的时代，除了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事业，还应有何求呢？”四是人民是他干好工作最大的底气：“我有信心依靠群众，创立新型的热带作物科学体系”“现在有党的领导，有海南几百万人民，什么办不成呢”“我们主要是依靠海南人民的力量”。始终心系人民，何康还是科技扶贫的最早实践者之一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儋州石屋大队种植橡胶低产低效，何康决定向大队免费供应良苗并提供技术服务，带动石屋大队做强集体经济，实现了农民就医、子女上学全免费，成为全国典型。何康不仅开展“科技扶贫”，还用自己获得的联合国“世界粮食奖”20万美元奖金设立了助学基金，开展“教育扶贫”，在之后的13年中资助了学农的贫困生近3000名。

三读何康“必须老老实实”的人格风范。何康的父亲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校长，用今天的标准看何康是不折不扣的“官二代”。但优渥的出身，却让何康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，难免有几分“先天不足”。何康经常在给夫人的信中“三省其身”，他说自己“未经过斗争的考验，未吃过苦，不知生活劳动的艰苦”。基于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认知，何康写道：“这些年党内的锻炼使我了解工作必须老老实实”。何康选择“老老实实”四个字



何康全家福。何康家属供图

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遵循，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真实、务实、崇实的人格风范。何康的家信文风平实，内容扎实，少有抒情浪漫，尽显敦厚之风。1958年的最后一天，在上海出差的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，读来更像来年工作思路，在信尾他写道：“我有坚定不移的信念，愿从事艰苦的具体工作。”他也多次在信中与夫人共勉，指出：“在理想上要有远大的目标，但在工作中，必须重视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”“埋头苦干，任劳任怨是个崇高的品德”。缪希霞从北京调到“两院”工作，一项重要工作是跑北京、上广州去要钱要粮要物资。1960年3月至5月缪希霞在北京盯项目，书中收录了这期间夫妻二人的23封往来书信。这些信基本不谈家事，何康的信多是工作指示和要求，缪希霞的信则是事无巨细的工作汇报，甚至几封信抬头是“康并转党委”，同时何康也会在信上作出批示。读完这些信，令人由衷感叹，这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。

书中还有两个小故事令人印象深刻。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，1958年7月，时年35岁的何康在京出差期间做了绝育手术。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：“我之以下决心做，主要是为了你的身体。我们应心连心，互相体贴，互相帮助，把我们全副精力投身于工作。”“文革”期间，何康受到不公正待遇，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，他仍坚持每月挤出5元交党费，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他又拿出一半交了党费。这些举动足见其对党之忠诚，信念之坚定。

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斯人之风不应离我们远去，《把心交给人民》所承载的思想价值，足以使其成为一部照亮我们精神世界的理想之书、信念之书、情怀之书。H